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六十二期（总第 312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9 年 3 月 10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国雷曼兄弟被允许破产，世界从此不一样了。在随后的几周里，亨利



美国财长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褪去光环，从万众期待的拯救者沦为了“不知道先生”。

金融危机正在世界深度蔓延，并且正在涉及全球实体经济，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两会”如期于 3 月 3 日和 3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这自然聚焦了世人的目光：中国政府将出台怎样的经济政策，中国将如何推动经济引擎高速运转去？中国将给世人怎样的信心与力量？

本刊在上期推出“金融危机与中央一号文件”之后，特此推出“金融危机与‘两会’”系列专题，同时新辟《高层一瞥》栏，敬请关注。

要目

●本期专题/金融危机与“两会”

政府报告回应百姓六大期盼

四万亿投资如何分配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两会”何以成世界焦点

《华尔街日报》：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受到质疑

德国《世界报》：《中国让世界经济抱有希望》

《纽约时报》：中国勾勒出宏伟刺激方案

●本期专题/金融危机与“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回应百姓六大期盼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记者张晓松、刘铮、钱春弦）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上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促进发展的报告，更是一个改善民生的报告，其中在促进就业、保障住房、完善医疗等六个方面回应了老百姓的期盼，受到全国人大代表的高度评价。

42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促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曾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亲身感受到就业压力的全国人大代表徐强告诉记者，目前许多大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面临着就业难题，他们在生活和心理上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希望国家出台有力措施促进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充分发挥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就业中的作用。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资金。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让我们看到了新增就业的希望。”全国人大代表高宝玉说，“我们相信，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效应会越来越明显，对增加就业的拉动也会越来越明显。”

三年解决近1000万户居民住房问题

一方面房价依然偏高，一方面许多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不少百姓通过新闻媒体寄语两会：“让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早日住上新房。”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争取用三年时间，解决750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240万户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直接惠及民生。”全国人大代表吴建平认为，国家的目标已经确定，关键是各级地方政府要抓落实，特别是要拿出足够资金为低收入群体圆一个住房梦。

实现全国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

近年来，在城市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村医疗条件还很落后。来自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全国人大代表吴再举告诉记者，山区农民群众看病难，去乡卫生院看病要走30公里山路。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全面完成规划支持的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今后三年内再支持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000所县级医院和2400所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建设，实现全国每行政村都有卫生室。

“总理的话讲到我心坎上了。”吴再举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他建议，国家在增加基层卫生院所的同时，要加大对村卫生室的投入，配备齐基本的药品、设备和医生。

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补贴有望增加

近年来，百姓期待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不断。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收入分配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告诉记者，一些国企负责人拿着相当普通职工上千倍的高薪，严重偏离了公平与效益兼顾的底线。

“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

“这显示了政府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的强烈意愿。”秦希燕代表说，“这有助于调动全体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万众一心，共渡金融危机难关。”

粮食最低收购价将再度大幅提高

谷贱伤农。粮食价格下降是近年来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向平华告诉记者，在他们那儿的一些农村地区，相比种粮食，农民更愿意种植果树、蔬菜和经济作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斤分别提高 0.11 元和 0.13 元。

去年，国家三次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幅度超过 20%。向平华代表认为，今年再次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将使粮价保持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极大调动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农民工子女将在输入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教育是百年大计，也是百姓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难问题，日益成为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数量持续增长，总数高达上千万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逐步解决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免费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郭国庆长期关注教育问题。他认为，此举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将使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所有青少年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四万亿投资如何分配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 3 月 6 日就国家 4 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发展计划的筹资、使用和监督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到目前为止，4 万亿的构成大体如下：城市民生工程，主要是保障性住房，4000 亿左右；农村民生工程，包括水、电、路、气、房，约 3700 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约 15000 亿；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方面，约 1500 亿；节能减排、生态工程约 2100 亿；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 3700 亿左右。

以上各项总和约是 30000 亿，再加上汶川大地震重点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 10000 亿，投资总量就是 4 万亿元。

对 4 万亿投资的监督工作将确保“两个明确”、“两个严格”，即明确投资方向和明确责任，严格审查和严格监管。(《北京日报》3 月 7 日王皓、徐飞鹏)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两会”何以成世界焦点

由于外部市场需求持续萎缩，中国今年在对外贸易上遇到的困难空前增大。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近日在一次研讨会上总结了几大难点，每个难点都与外部环境直接有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之一，中国是一个重要指标，其贸易额的急剧下滑显然标志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外贸出口虽然急剧下滑，但过去几个月的顺差却依然庞大。今年 1 月，中国出口额减少了 17.5%，顺差却高达 391 亿美元。这一方面是因为进口额也在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某些产品依然拥有庞大的海外市场。

扩大内需已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去年底，中国政府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双管齐下，一是推出 4 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相关产业的扩张；二是连续多次降息，以刺激国内投资。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家电零售优惠措施，刺激农村地区的消费。

在主要经济体都感到囊中羞涩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这些大手笔自然使各国为之瞩目。中国经济增长固然也遇到巨大困难，但从各方面来比较，它是唯一能让人产生乐观期待的主要经济体，最主要的表现是，其银行体系没有被破坏，金融秩序依然稳定。

尤其是在刺激经济配套和新货币政策开始落实之后，中国经济立即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中国政府去年 10 月宣布取消借贷上限，结果使银行贷款大幅度上升。今年 1 月，尽管春节假期银行休业多日，但新贷款数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同样，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在猛增，去年 12 月的交通设施投资就比一年前增加了 61%。基础设施项目的扩建，拉高了原材料价格，例如钢铁价格就比去年 11 月高出 20%。

对于以上情形，外界都在密切关注，或乐观或悲观，众说纷纭。这也再次表明，中国经济的任何一个表现，都会影响各国对本身经济前景的预测和判断。实际上，中国能否早日走出金融危机，能否率先复苏，外界更是在密切观察，其中最大的疑问是：依靠现有的刺激措施，中国是否足以快速复苏，是否足以达到自己设定的 8% 的增长目标？

这个关键的疑问，使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在不久前的欧洲之行中，温家宝总理公开表示，在必要情况下，中国政府还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引起了各国政界和舆论的关注。而在上周末与网友对话时，温家宝再次提出了加大救市力度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 2009 财年的预算赤字有可能达到 950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GDP 的 3%，为最近几十年来之最。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和美欧，必定都会密切注视北京“两会”的动态。

中国内需的旺盛，意味着它将大量吸收外国产品和原材料，从而直接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凭借现有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还有政府的强大购买力，中国经济是具备这种辐射能力的。最起码，中国可以自救，不会给其他国家增添负担，反而还有意愿和能力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机会。因为有这些原因，中国今年的“两会”格外引人注目，就是很自然的事。

《华尔街日报》：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受到质疑

在中国各省、市及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际，有一个话题势必引起热烈讨论，那就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是否得当。

甚至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周四开幕之前，中国不佳的经济状况就已经使得此次会议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中国基准股指周三上涨 6%，因为市场憧憬本次全国人大会议或为经济带来支持，韩国等其他亚洲市场的人气也因此受到提振。另外，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提升了市场信心；该数据显示 2 月份经济情况有所改善，制造业虽然还处于萎缩状态，但恢复扩张可能已为期不远。

在被问及有传言说政府可能推出另一个大型刺激方案时，李肇星重申了中央政府的现有计划，即未来两年将斥资人民币 1.1 万亿元（合 1,610 亿美元）以刺激经济增长。该计划于去年第四季度启动。今年的确切支出计划尚未公布。

李肇星未列出新的扶贫措施，官方的会议议程也显示，代表们不会讨论新的立法。李肇星说，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传达出一种积极的态度。李肇星表示，这次会议对于中国人

民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的大多数实质性讨论可能出现在分组会议上。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人们的一个重要质疑在于，中国有多少问题是源于全球危机，又有多少问题是源于国内因素。

中国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李肇星在讲话中也重申了中国以往的观点，即导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机制出了问题，这一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但中国一些人士则认为，全球经济放缓出乎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其他领导人的预料。

仅一年前，就在全球经济即将放缓之际，中国还在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避免通货膨胀失控和经济过热。中国政府上调利率，并允许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从而降低了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受政府紧缩措施的影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和住房价格在去年春季已明显放缓。但直到去年 6 月末，中国政府还在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到去年秋季，政府不得不采取截然相反的行动，与其他国家一道放松货币政策并新增支出。

虽然其他国家的政府去年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但中国政府未能尽早采取行动以刺激经济增长还是引发了批评的声音。这些批评主要针对主张改革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他推动人民币汇率走高，并维持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此外，中国部分人士对经济规划缺乏透明度也提出批评。据一位中国记者透露，一些老资格的前改革派官员最近致函政府，呼吁增加刺激计划支出的透明度。这位记者见过这封信函。还有人公开呼吁政府把资金用在老百姓身上，而不是用于更多基础设施。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研究员及互联网评论员曾景忠表示，关注重点应该是医疗保健、教育和脱贫。

曾景忠说，过去总是强调 GDP 增长率，但忽略了不断增加的社会问题；如今应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民生问题上。(IanJohnson/J.R.Wu)

德国《世界报》：《中国让世界经济抱有希望》

迄今为止，大多数中国人显得受危机影响不大。中国总理温家宝 5 日允诺 8% 的经济增长率。全国人大代表报以掌声，并点头表示赞同。

文章援引金融信息及资产管理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霍夫曼的话报道："那些失业的人或者目前很难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当然在遭受经济危机之苦。但其他人一切照旧，他们在正常消费，并持乐观态度。"

许多专家认为这种乐观是恰当的。法兰克福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和汉学家卡斯滕·赫尔曼

-皮拉特说："中国受危机的影响将比西方国家少。因为中国在农村地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位教授指出，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农村地区被政府不可原谅地忽略了。但现在出现了政府改变航向的迹象。生活在农村的约 6 亿人口可能相应地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赫尔曼-皮拉特说，"例如使农民容易得到贷款也许是一种办法。"那么这可能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引起一场小小的革命，从而也推动农村居民的消费。

专家们相信北京的经济刺激计划能获得成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值自年初以来已上升了 20%。

《纽约时报》：中国勾勒出宏伟刺激方案

周四，伴随着对中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的警告，温家宝总理描述了一系列建设、补贴等经济措施，旨在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继续推进。

他还表示，中国领导人将通过鼓励国民像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消费来寻求经济战略的根本改变。截至目前，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和对公路、水坝和其它基础设施项目的大量投资来拉动的，专家们认为这一方式在长期无法持续下去。

但是，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讲话并未明确宣布对抗金融危机的追加方案。中国去年 11 月宣布了一项规模达 5850 亿美元（4 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出于对温家宝总理将在周四宣布新的经济刺激方案的预测，中国股市周三上涨了约 6 个百分点，世界其它地区的股市也出现了上涨。

温家宝说，尽管 2009 年将是困难的一年，但中国的经济战略是合理的，中国的基本面也是积极的。

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的演讲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平安渡过全球经济动荡，一是保持社会稳定。瑞银证券驻北京经济学家王涛（音）说：“社会稳定绝对是政府关注的对象，这一直是最大的关切。所有的一切，包括促进增长和抑制失业都是为了稳定。”

王涛说，中国去年 11 月宣布的刺激方案主要集中在建设项目上，这对于中国快速恢复经济很有帮助。而温家宝总理周四宣布的社会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同样重要。温家宝表示，中央政府将大幅增加对学校、医院、门诊、低价房、环境和其它项目的投资，改善民生。他还重申政府将为农民提供补贴，为本国最贫穷的群体提供养老金，并表示对社会保障网的投资将增加 17.6%，达 64 亿美元。

温家宝还表示，鼓励消费需求将成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原则和刺激经济增长的起点。说服中国消费者放弃长期以来的储蓄习惯可能并不容易。中国周四公布的官方文件计划增加对

消费者的贷款，减少个人所得税，为一手房、车和二手房、车培育市场。文件还表示要为农村居民购买消费类电子产品提供补贴。

中国在高速公路和铁路、低价房和能源储备等主要项目上的投资将增加两倍多，达到约1320亿美元。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全国人大会议来向民众展示一个团结的和自信的党。中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目标之一就是确保失业不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点。(迈克尔·瓦恩斯。唐湘)

香港《明报》：温家宝报告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铺垫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从3方面切合中国需要,不但着眼于应对危机，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铺垫。

总理温家宝5日发表近年最重要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全球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主要市场又陷入深度衰退情况下，可从3方面检视工作报告是否切合中国需要：一是中国如何应对眼前艰难局面；二是如何为中国在下一个经济周期来临之前，做好准备；三是如何调整、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使之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温总理的工作报告在这3方面都提供了答案。不过，人民关心政策能否到位、落实和会否导致更多贪腐行为，现在就看温总理所说的“行政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落实到哪里，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会否真个实现了。

扩内需力争增长保八让人民得实益促和谐

第一、如何应对眼前艰困局面？当欧美主要市场经济衰退，消费大幅萎缩，中国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首当其冲，去年全年GDP为9%，但是第四季只有6.8%，下滑速度使人惊栗。温总理提出今年GDP增长为8%左右，并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争取达至目标。

温总理明言以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按温总理的说法，“保八”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温总理订出“扩内需、保增长”为今年政府工作原则之一，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投资计划、10项产业振兴规划和破纪录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投资，达到1500亿元。此外420亿元协助高校毕业生就业；400亿元“家电、农机、汽车、摩托车”下乡；争取用3年时间，为750万户城市低收入家庭和240万户棚户区居民提供居所；拨款120亿元，提高1200万名中小学教师待遇。

至于对“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今年投入7161亿元，较去年增加1206亿元，连今年小麦、稻米最低收购价平均每斤分别提高0.11和0.13元，也开列出来了，可见温总理

要使人民感受到实益的用心。

温总理在工作报告用了近六成篇幅讲述一篮子计划，上述撷摘只是荦荦大者，总之目标是力争“保八”，以保民生和促进和谐。

危机迫使中央下决心调整结构内需拉动增长

第二、如何为中国在下一个经济周期做好准备？中国过度倚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暴露无遗。

数年前，中国就增加内需在经济增长的比重，早已提上议程，但是在经济好景时，外贸财源滚滚来，没有刺激内需的迫切需要。

这次温总理在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内地学者注意到，温总理这个论述，在以往的政府工作报告甚至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未出现，温总理今次提及，显然是危机迫使中央下定决心，大力推动内需来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增长模式。

增加内需，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肯定有其效益，不过，要使内需可持续并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最根本做法是鼓励人民消费、健康地消费。要做到这样，首要是政府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投放更多资源，纾解人民的后顾之忧。

就此，温总理在工作报告已经着手处理，例如今年虽然中央在社保基金投入 2930 亿元，较去年增长 17.6%。只要中国坚决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则显示中国在下一个经济周期来临之前，已经有所准备。这是为中国经济的更均衡增长，作了初步铺垫。

节能减排取得初步成果结合科技走绿色经济之路

第三、至于调整、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使之可持续发展方面，温总理也有处理。他把科技创新与扩内需、促增长，调结构、上水平结合起来，今年在科技投入 1461 亿元，较去年增加 25.6%，争取尽快突破一批技术，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支撑产业振兴和经济长远发展。

30 年改革开放，经济成就斐然可观，但是高耗能、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使中华大地付出沉重代价，部分山川河流湖泊被污染的程度，使人不忍卒睹。近年中央决心投放资源改善，3 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10.0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少了 6.61% 和 8.95%，其它如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推进天然林、青海三江源等生态建设工程，也取得成果。

温总理强调要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打造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使人欣慰。

不过，在现有基础上，中国应该结合科技创新和节能环保，创造出不仅是消费式的环保经济，而是有巨大商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中国绝对不应该重蹈美国消费主义的老路，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好像美国人般无节制地消费，这个地球的资源也支撑不起。中国要走一条有特色的内需、消费之路，绿色经济肯定是最佳选择。

"两会"另一面：年度政治"盛宴"细节观察

中央的鼓励、寒暄与批评

从3月5日下午开始到3月6日，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分别到自己所属的代表团参加审议。其中胡锦涛在江苏代表团，吴邦国在安徽代表团，温家宝在甘肃代表团。

3月5日在海南代表团，参加审议的国务委员戴秉国，首先跟在座的记者一一握手，笑言问候，然后在会上说，希望海南发挥优势，发展成为世人向往的“天堂”。

不过中央高官到地方团，也不全都是鼓励慰问。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一次到东北某省代表团参加审议，一位主要官员的发言被她当场打断，她半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别说套话了。”

而今年的批评者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湖南团3月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一位公司总裁建议官方为他们的海外并购提供资金支持。王岐山听后说：“海外并购难道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吗？你吃得下来？管得了它吗？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这种信心会让我害怕。”

出身地方的中央官员多会在全国“两会”期间去看一下自己原来的地方代表团。这也是惯例。3月3日下午，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分别去了辽宁和江苏代表团，此前他们分别是上述省份的省委书记。

2007年“两会”期间，时为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便在餐厅挨桌跟旧部握手寒暄，薄此前曾任辽宁省省长。东北官员爽快，有直接邀请薄喝酒者，被薄笑拒。

中央高官在“两会”期间如何吃饭？简简单单吃。3月6日上午，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团参加审议，中午就在江苏代表团所在的餐厅跟大家一起吃饭，一桌4人，江苏地方高官作陪。除了李源潮取自助餐时众人谦让在后外，吃饭期间大家亦各行其是。就在李源潮的邻桌，一位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的采访。20分钟后，李吃完走人，几位江苏官员相送，要出宾馆大堂门口时被李用手止住。“两会”期间，还有为数众多的部委中层官员旁听各代表团审议，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为主。我接触的发改委官员说，能上会旁听的，都是发改委司局级官员。他随后向我出示了长长的名单，有一百余人。

根据各个代表团的的不同特点，国家发改委决定旁听人员，比如上海有财政金融司的副司

长，山西有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浙江则是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副司长。

这些旁听人员负责解释计划和预算等情况，并记录代表们的发言。手握实权的司长们，此时看起来更像“速记员”：按规定，发言要分段整理，字迹要清晰。而且上午的发言记录要在下午 2 点前上交，下午的则在晚上 7 点前交回。

低调的官员们

诸如广东、上海这样的地方高官们，会更开放些。在 3 月 6 日的上海团小组审议中，上海市市长韩正当着记者的面，开玩笑说上海团某代表应该多接受采访，因为这位代表的小平头在电视上看起来会很好。

一般来说，“两会”上，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会更谨慎，如果赶在中共党代会前后，更是如此。

比如 2007 年的全国“两会”，就恰在中共“十七大”前。相关“明星官员”大都缄口不言，只在央视和《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说几句。其时，我曾试图约访一位如今已在中央任职的省委书记，但总是难以找到机会，最后不得不在名片上写了一段话，塞到了这位省委书记房间的门缝里。

后来该省省委办公厅的官员主动打来电话说，省委书记已经看到纸条，但是因为确实繁忙，所以嘱咐他打电话说明。

我们接触的另外几位政治明星，基本如此，态度友好，但婉拒访问。本报记者其时想采访某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在餐厅角落中见到他，走过去问好。对方站起来也问好，一边看着名片，一边说：“我现在不接受媒体采访的，本地的媒体都不接受，对不起啊。以后一定会找你的。”“那是什么时候？”“时间肯定我说了算。”他笑言。

2008 年全国“两会”，又面临政府换届，而省长们也大都刚在地方“两会”上“新转正”，自然不宜多说。我约访中，省长们讲的最多的是，“过段时间吧”。一位中部地区的省长说得直接：“刚就职几个月就讲本省应该如何发展，只能被人说浮夸。但如果说还在调研中，没有最终的思路，我还说什么呢？”

去年我也在北京团的小组会上就奥运问题约访新任的北京市市长郭金龙，递上采访提纲后，郭详细看完，然后说奥运问题北京有专门的发言人，“我实在不好回答，但是你们的提问让我们了解了媒体的关注点，还是多谢了”。

而今年“两会”有所不同，因为没有人事问题，各地方大员们都颇为放松。各媒体上，省级高官的访谈也多了起来。有的省委书记拒绝采访时也很实在，会拍着我的肩膀说，自己

已接受过某媒体采访，同样的话不能反复说，以免被人指摘，还请谅解。

一般来说，地方高官们接受采访主要是谈当地省情，而跟个人有关的问题则属敏感范围。不过也有一些开明的官员会打破这个固有印象。本报记者曾在电梯口拦住东北某省的省委书记。他一开始也推掉了采访，说谈发展还是去采访省长。而当本报记者说主要想聊聊你自己的经历时，这位省委书记转过头对秘书说，“这倒是可以谈谈”。

2008年，我约访当时刚复出的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孟婉拒，后来我们写了一个纸条，其中提到了因为 SARS 而造成的对他的舆论恶感。不过孟并未恼怒，后来也接受了采访。今年，在山西省长任上再度请辞的孟，依然保留着人大代表的资格，并参加了开幕会议和当天下午的全团审议，不过半个多小时后即离去，未发一言。山西团的官员跟我提到孟时，言语之间，颇多惋惜。

诸如广东、上海这样的地方高官们，会更开放些。在3月6日的上海团小组审议中，上海市市长韩正当着记者的面，开玩笑说上海团某代表应该多接受采访，因为这位代表的小平头在电视上看起来会很好。

若从形象变化上，或许也能看出高官过去一年的心情。央行行长周小川头发已见花白，看起来是部级官员里变化最大的一个；而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比起当安徽省委书记时，白头发好像减少了，显得更年轻。

事实上，地方市县的代表和官员，更容易接受采访，因为他们往往还肩负着宣传推广本地的任务。热点地市，诸如东莞、温州、沈阳等自然不愁，而一些偏僻市县，不是关注焦点，所以跟随而来的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官员，就要主动想办法联系媒体。

除正常开会外，和部委或者银行等机构沟通，或许是这些地方高官的另一任务。3月6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审议，其后跟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关门商谈了一个半小时。重庆方面的官员说，国资委和重庆今年“将筹划更大的合作”。

诉求中央诉求媒体

我在采访时曾多次听到有地方官员代表要求财政部或者发改委应该支持当地某项目，而部委官员此时大多微笑不语。不过代表们总是能“巧妙”地将共性问题和本地区本行业的特殊要求结合起来。

比如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就对到会旁听的财政部官员提到了几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要求：

第一是对中西部老师的补助不够，“我不光是为重庆提，也为整个中西部提。”黄说，“还希望财政部多理解，我相信教育部明白这个账，它可能是要不到钱。”

另外希望国家改革资源税，黄又说，“我们是站在西部的角度，西部地区的资源比较丰富，提高税率对西部有好处，对西部大开发有利。”黄说，如果财政部同意这个意见，“我们就报一个这样的议案，呼吁呼吁，财政部也好加快推进速度。”

第三个提议关于西部大开发。“我希望是不是可以把西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调低，这样全国各地的人才就有动力到西部发展。”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尹家绪的发言重点是汽车产业的政策问题，他指相关消费政策力度不够。“家宝总理到了重庆，谈到要鼓励农民购买，包括摩托车要下乡，但是现在商务部已经停止了摩托车的下乡的招标，这对重庆和摩托车业都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说。

地方诉求除了面对中央部委外，亦重视舆论宣传。

全国人大方面要求各省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原则上要有一次开放团组活动，中外媒体可以旁听采访。我在本次全国人代会期间，曾旁听了一个中部省份的会议，内容是关于该代表团团组开放并接受媒体提问的准备。

会上，相关官员详细说明了代表团哪些代表负责回答哪一方面的问题。并提要求说，代表回答问题时“既要精练又要说透，要用面对媒体的语言”，“通过媒体把我们想说的说出去”。

这名官员提醒说，因为是开放性提问，“我们事先收集了一些可能会问的问题，我看挺够呛的，比较尖锐。人家提出来了，你就只能应对。”他说，“如果没有直接点到书记和省长，那么谁负责相关领域谁就把这个问题接过来。”对于舆论的重视正在成为各地代表团的共同做法。我曾去约访另一位中部省份的省委书记，而其时他正在房间内召集官员汇报最近几天媒体对该省的报道情况。（《南方周末》马昌博）

●高层一瞥

张平：冰火两重天的考验

“4 万亿”投资计划中，铁路建设占大头。危局下，中国经济也充满“跨越式发展”之机。CPI 从 8.7% 下降到 1%，PPI 从 10.1% 下降到 -3.3%，短短数月，中国经济经历了从“炙热”到“寒冬”的骤变，对于执掌国家发改委刚满一年的张平而言，如何行使好这“半个国务院”的宏观调控大权，正考验着他的智慧。

一年前，当 62 岁的张平从他的前任马凯手中接过“接力棒”时，并没有料到一年后他将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在中国，作为具体掌控和行使国家宏观调控大权的核心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直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在民间一直有“半个国务院”之称。张平的两任前任曾培炎和马凯，在从主任的位置卸任后分别官拜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在接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一职前，张平并不为外界所熟知，但他的出场却独具一格。2008年3月19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工作交接会议上，即将卸任的马凯当面盛赞他这位继任者“协调能力极强”，马凯还透露，在张平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很多棘手事务都交由其协调处理，“令总理很满意”。

而同时公布的这位新科主任的履历，更在当时刮起了一阵不小的旋风。“1966年毕业于安徽银行学校信贷专业，中专学历”，这在当今中国部级官员的群体中，可谓罕见。这也明示，张平的擢升，依靠得更多的是其过往成功的实践。

在2005年调任北京之前，张平一直在他的故乡安徽。从人民银行最基层的营业所会计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用了整整38年的时间，因而当之无愧地获得了“长期扎根基层，工作务实”的美誉。2005年7月，年近六十的张平带着他在安徽成功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来到北京，直到2008年3月接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开始了他人生的新旅程。

此时等待他的，是如火如荼的“过热的”宏观经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7%，创下了近12年来的新高。“过热”炙烤着每一个国人，只是，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从“经济过热”的大火，到“经济危机”的冰封，转换会如此之快。

作为行使重大项目审批大权的掌门人张平，首先必须坚决执行温家宝总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指示精神。2008年12月召开的国家发改委工作会议上，张平再三告诫全国发改委系统的官员们，要“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中央决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改进工作方式，健全科学高效的投资计划和项目下达方法”。

当前，“4万亿”计划尚任重道远，由国家发改委主推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亦已陆续出台。但危机的寒冬依然持续，人们期待张平这位务实低调的掌门人，在这次寒冬中的表现，再次能“令总理满意”，令寒冬中的人们满意。

谢旭人：视线外的“大司库”

一边是“增支”，另一边是“减收”，捉襟见肘是财政部上下的感受，“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筹钱”。“2009年将是财政非常困难的一年”。这成为最近中国财长谢旭人被外界引述最多的一句话。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被允许破产，世界从此不一样了。在随后的几周里，亨利·保尔森成为全球媒体上出现最频繁的名字，这位自信、强硬而又大权在握的美国财长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褪去光环，从万众期待的拯救者沦为了“不知道先生”。

与之相比，中国财长谢旭人几乎是生活在公众视线之外。他在媒体上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人们记不住他说过什么，更无从得知他在做什么。在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上，从2007年8月上任至今，谢旭人的“重要活动”不过寥寥十余项。

“财政部是一个被动的部门，基本是执行国务院的政策措施。”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虽然中国的国库充裕为各国所羡慕不已，在外界看来，金融危机下，中国的财政部长或许应该是全球最游刃有余的财长，但是，谢旭人的2008年，丝毫不轻松。

谢旭人在不停加班。陪同领导人出访、参加国际的多边或双边会谈、调研、开会、讨论……时间如此不够用，他多年的习惯——每周爬一趟香山，也不得不放置一边。

部下对他的评价是“严谨、细致、廉洁、不辞辛劳”。这位出生于浙江宁波的技术官员，对细节和数字要求极高，部里的人都知道，如果部长发火，原因基本不外乎——提交上来的报告里情况不明、数据不准确、没有说清楚。

一些重要的报告，不管多忙，谢旭人会亲自动手改，常常是“改动的字数，比原稿的字数还要多”。将提交全国人大讨论的2009年预算案，部里上下改动了“即便没有一百遍，几十遍肯定是有的”。

缘何如此勤勉、辛劳？一部分原因是性格使然，另一部分原因是现实所需。

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从“防过热”到“保增长”的陡然转向，对于财政部而言，这意味着工作方向的全盘逆转，所以，更清晰地了解现实实属必要。

而且，南方冰雪灾害、通货膨胀、汶川地震、全球衰退带来的经济下滑、两千多万民工失业、北方旱灾……事件接踵而至，每一项事件的应对都意味着大笔计划外的财政支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支出，钱从哪里来，则是“大司库”需要解决的问题。谢旭人表示，“2009年将是财政非常困难的一年”。这成为这位中国财长被外界引述最多的一句话。

孟建柱：维稳，图变

2008年7月，北京特警“蓝剑突击队”进行奥运反恐战术训练。经济危机客观造成社会矛盾突出，人民警察“维稳”压力大增。

对属下强调，面对群体性事件，各地公安要“及时、主动、准确、统筹”加强舆论引导，

“深入研判舆情发展走向，准确把握媒体需求和受众心理，有针对性地主动发布正确信息。”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最近正忙两件事：第一是发动包括自己在内的百万警察去和中国最底层的公众交谈，以化解矛盾，维护人心；第二是开始轮训中国三千多名县级公安局长，以求助力基层，提高应变能力。

在培训中，孟的下属们诉苦说，当前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是县级公安局长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从去年开始突然恶化的经济形势正导致诸如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这给中国带来大量不稳定因素。去年底，广东东莞一些被辞退的工人掀翻了警察的巡逻车。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称，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而恰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央政府对于“稳定”的要求也正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强调。

不过对孟来说，或许也没什么“突然”的紧张。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和他领导下的190万警察，已经在面临持续不断的压力。

2008年3月，拉萨爆发“藏独”骚乱，此后几天内，在甘肃、青海和四川“藏独”骚乱蜂起。孟和其治下的公安部首当其冲，迅速控制事态，抓捕骚乱制造者。半个月后，公安部宣布，掌握了“达赖集团”组织拉萨骚乱的证据。

3月23日，在不断升温的舆论中，孟率由统战、外宣、公安、宗教、国安、军队等各部门高级官员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拉萨察看“维稳”及社会秩序恢复情况。孟说，“任何宗教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被视为代表中央的表态。

随后的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而当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专机中即有孟建柱随行前往。3天后，公安部已经抽调了1.3万名特警、消防和边防医疗人员，来应对这场唐山地震之后的大灾难。

6月28日，瓮安事件。事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说，事发当日，孟建柱曾数次打电话给他，直接指挥研判。紧接着，杨佳暴力袭警案、陕西府谷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而孟此时亦要面对群体事件中如何处理警民关系的巨大考验。

然后北京奥运会来了。在7月下旬的动员大会上，孟说，做好奥运安保工作，是当前全国公安机关的头等大事。中国投入了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安保力量，仅北京，参与安保的警力就有11万。但8月4日，奥运前几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边防支队遭遇暴力袭击，16人死亡。官媒称其为“暴力恐怖袭击”，是近来中国相继发生的暴力袭警事件中，官媒首次使用“恐怖”二字。

气氛紧张起来，但最终，北京奥运会安然无恙。孟建柱和他的公安部完成了任务。孟开

始思考了。2008年的11月初，孟在中共中央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求是》历来被视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

文章中说，“难以预料的挑战和风险明显加大”，而“境内因素与境外因素相互影响日益明显”。孟又提到，“群体性事件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如何“有效避免和防止发生连锁反应”是一个“新挑战”。

孟特别提到，在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条件下，如何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要求“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并说这是做好维稳工作的“新考验”。

这位公安部长由此要求自己的属下，“遇到挑衅、面临复杂情况时，不冲动、不感情用事，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激的事……要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心理的变化和执法对象的感受。”

他特别强调说，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警察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局势失控”。要“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孟说，“凡调用警力参与重大非警务活动的，必须逐级上报、严格审批。”而各地公安要“及时、主动、准确、统筹”加强舆论引导，“深入研判舆情发展走向，准确把握媒体需求和受众心理，有针对性地主动发布正确信息。”

孟的风格依然是一贯的务实和朴实。年初，他在给前来轮训的公安局长们上第一课时，讲了3个多小时，中间并无念稿，发言中他要求下属们“少说正确的废话”。一位公安系统的人士说，孟看起来要比初来公安部时消瘦。这或许也是这位公安部长，此时压力的另一种写照。

周小川：从强硬“降温”到全力“加温”

周小川要求人民银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并指出，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人民银行肩负着实施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的重大历史责任，“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人民银行的职责”。

做文化部部长的不必是艺术家，当体育总局局长的不见得要奥运冠军，甚至出任卫生部部长的也不一定要当过医生，但是，做央行行长的如果不是经济学家，就委实有点勉为其难。

从1984年成为“中央银行”以来，今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之一。其职能有点像医生：不断地望闻问切中国经济，它是热了还是冷了。热了呢，就降点温；冷了点，就加点热。

这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活。而仅仅凭借学识，周小川位列其中也称得上是“管乐有才真不忝”：出身清华大学工科博士的周小川在工作之后，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并两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

尽管如此，央行行长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即使对周小川来说。

当下，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责主要是，“降温”持续的时间过长，而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没有及早将“降温”改为“加温”。

2002年12月，周小川走马上任央行行长时，正是一轮经济从启动到快跑的时间。此后，经济一年热过一年，央行——乃至整个国务院——都把“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工作重点。“降温”也好，“加热”也好，周小川手里的牌还是比较有限：利率、央票、存款准备金以及勉强能动的汇率，当然，还有为“市场派”所不屑的行政命令。

呈加速度增长的外汇储备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平添了不少麻烦：依照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人民银行无条件购进外汇，形成外汇储备，同时发行相应的人民币。依照当下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计算，仅此一项，占广义货币的四分之一强。（2008年12月底，广义货币M2为47.5万亿，同期的外汇储备为1.95万亿美元。）

所以，在出任央行行长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周小川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或者说，就是给中国经济“降温”。这一思路，一直持续到2008年，当年3月、4月、5月和6月，每个月都有一次“降温”动作，或加息，或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周小川是热爱音乐的人，音乐本不倾向强硬，但是6月间，周小川在10天内3次就货币政策进行强硬的表态，坚持要把“降温”进行到底。

然而彼时，至少从陡峭上升的民间借贷利率以及连绵下跌的股市来看，“降温”政策，似乎已经该打个问号。

2008年9月以后的经济形势突变，终于令“加温”成为唯一的政策选择。9月15日央行下调贷款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仅加息变成了降息，提高变成了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而且速度更惊人。

是周小川还是更高层的官员主导了这一轮“加温”，不得而知。现在能看到的是，牛年新年后，股票市场出现了一波缺乏基本面支撑的上涨，这显然有“加温”的贡献；当然，也有与此相对立的现象：物价开始出现下跌了。

如果撇开具体政策的制定，也许摆在61岁的周小川面前的还有更具战略性的工作：汇率改革是否可以考虑步子迈得更大一点？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可以探探路？外汇储备的结构是否可以考虑调整调整？当然，在中国的政府运行格局下，这些已超出了央行行长的实际决策范围。

陈德铭：“温和”部长面临一场硬仗

2009年的1月，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出差，1月上旬去了一趟重庆，中旬访问非洲三国，27日大年初二，他和数名部委官员一起，陪同温家宝总理一起访问欧洲四国展开“信心之旅”。

调到中央工作之后，他再也没有什么时间锻炼身体了。“他比以前胖了，也更虚了。”一位熟悉陈德铭的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在陕西做领导的时候，陈德铭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周末还偶尔出去转悠，现在完全没时间。

经济危机发生后，陈德铭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他的老父亲曾和人聊起儿子：他就是晚上8点从国外飞回来，也要先去商务部办公室而不先回家。

忙碌是身不由己的。这个性格温和的上海人，正面临一场硬仗，从西部农村到东部沿海，从非洲内陆到纽约、伦敦，都是他的战场。

数年之内，陈德铭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转换，从东部的苏州来到西北大省陕西，然后又到发改委，之后迅速执掌商务部。从工作舞台到具体内容，一次比一次变化大。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上午分工结束，下午就接手所有工作”。他的老师、南京大学教授周三多也曾对他的大幅度转换感到担忧，“这文件怎么批？”

这样的转换，在他到商务部上任之后，并没有停止。最初他面临的是外贸顺差过大、贸易磨擦、外资并购等问题，他曾预计外贸出口不会出现拐点。没想到几个月之内，经济危机令国内外形势迅速转换，这些问题迅速被外贸下滑、内需不足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棘手的问题取代。商务部一方面要四处出击，扼制中国外贸出口迅速下滑的势头，另一方面要深耕国内消费市场，想方设法启动内需。两大任务，一场大考。

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焦虑的

1月6日到8日。陈德铭到重庆考察扩大城乡消费情况。一位跟随考察的工作人员介绍，他在整个考察过程都显得非常轻松。在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见面时，他甚至手搭在薄的肩上，一大堆人谈笑风生。

他说话做事没有架子。在重庆考察期间，陈德铭到了村里，把大家喊到一起，找一条稳一点的长凳，大家全挤在一起。跟随他的人回忆，陈德铭就像村长一样，“姿态放得很平”，大家和他说话都非常轻松。他问得非常细致，甚至会问农民看什么书。碰到老乡说了什么他觉得重要的问题，他马上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记下来，看能不能处理。

但一位熟悉他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这场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他在内心其实是非常忧虑的。私下交流时，他曾提起过，对现在的经济形势不能过于乐观。

陈德铭务实的一面体现在，他特别重视操作层面的东西。他曾说过，“一件好事情，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如果操作层面没做好，搞砸了，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在重庆考察“家电下乡”，他特别关注家电在农村的特殊需要，以及配套的售后维修服务等问题。回京后，商务部按照他调研的情况，迅速扩大家电下乡的品种和范围，2月1日开始，新增四个产品，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

他非常重视城市服务业，曾在多次考察中讲起，要重视家政服务、早餐工程、废旧物的回收和再利用等，一是可以扩大消费，二是能容纳非常多的就业岗位。而这些，恰恰是一些地方主政领导不愿意去面对的。许多人更乐意搞政府投资，上大项目，不愿意做这些琐碎的不易见政绩的工作，去解决居民生活的实际问题。

陈德铭早年是商贸出身，对于内贸问题早有经验。在东部工作多年，又在西部大省陕西担任领导职务数年，陈德铭也拥有对中国广阔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深刻了解。

今年过年没回家

周三多认识陈德铭十多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在他之后出任过苏州市委书记的吉林省委书记王珉曾经感叹：陈德铭这样的性格，到了东北可不行。

当陈德铭接掌商务部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商务谈判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协商和妥协，他的温和与沉稳，倒是非常适合担任商务部长的职务。

陈德铭的平和，很快被商务部工作人员见证——他接掌商务部多日后，有中层官员竟然感觉“跟以前工作一样，没感觉换了领导”。实际上他和前任商务部长、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性格完全不同。

对于熟悉陈德铭的人来说，在深入了解情况之前，陈德铭从不轻易表态，而一旦表态，必定会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一位人士回忆，去年中央作出“4万亿”重大决策。当时开会的时候，许多部门领导欢欣鼓舞，认为这是经济的转折。但陈德铭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看法：对经济危机不能这么简单来看，要考虑“4万亿”的效果如何，钱从哪里来，会不会引起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尹蔚民：专业部长力战失业

全球性经济危机下，就业问题却已成为最大的政治之一，频频进入外国媒体的视野——他们在观察失业给中国带来的维护稳定的压力。而坐镇“维稳”因果链上这重要一环的，正是尹蔚民。

尹蔚民可谓人事工作的专家。从中组部开始，一干30年，他亲身经历过人事部门与劳动部门25年间的三度分合。他2000年调任人事部副部长，2007年升任部长。去年的大部制改革中，人事部与劳动部合并为人保部，尹蔚民成为第一任部长，他谦虚地说“出乎意料”。

“无论是谈及人事制度改革，还是社保的现状及趋向，他都是熟稔于心、娓娓道来。”尹蔚民对所司工作的热忱与熟识，令曾经专访过他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印象深刻。

合并之初，劳动和社会保障，对尹蔚民来讲还是块全新的领域。“压力非常大”，他曾坦言。而现在，在部内大会上，尹蔚民已经常脱稿，大量引用就业、社保等数据。“他很快就进入了社保领域的工作，令人敬佩。”一位人保部官员将此形容为“部长自身的漂亮转变”。

尹蔚民向来重视专业能力。“‘一般干部对业务工作应知应会，处级干部行家里手，司级干部专家权威’，这是他对我们的起码要求。”上述官员说。

在人保部建立的一年时间里，该部先是忙于新部委的内部整合，探索大部制下各职能的有机统一。而到总结一年工作的时候，尹蔚民已经可以用“高效顺畅”来形容新的机构，而此项改革也被人保部内部视为一年工作中的亮点。

不过，又过了半年后，经济危机来袭，尹蔚民迅速开始力战失业的征程。“中国就业问题之复杂、就业任务之艰巨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有过的。”尹蔚民曾说。现在，更是难上加难。毕业生年年递增，而经济危机下的岗位需求却在不断缩减。招聘市场里已难觅大型跨国企业的踪影，拥挤程度却依旧堪比春运之时的火车站。霜雪并至，几个月来近 2000 万的找工农民也盼望着政府出手相救。

尹蔚民亲自督阵，奔赴外向型企业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摸底劳动力和人才市场，他对农村产业工人的失业状况尤为重视。不久，他又派出多个专题调研组，奔赴长三角、重庆、河南等地。准确把握事态，一直被他视为制定计划的基础。

随即，人保部关于就业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密集出台，“尹蔚民”三个字以一天多次的频率出现在各大媒体以及大专院校的内部论坛。与他的专业作风一样，他给媒体留下的是友善却又严肃、低调的印象：工作之外，很少言及其他。

尹蔚民提出了七项工作重点，以缓解就业压力：如通过保企业来保岗位，以鼓励自主创业拉就业，及时消除就业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在他眼中，全国的人力资源是一盘活水：打破城乡界限，鼓励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有人戏称这一政策是“新时期的上山下乡”。（《高层一瞥》栏文章选编自《南方周末》）